

非洲政治哲学的“世界”转向： 论姆本贝的思想贡献*

邓皓琛**

【内容提要】 喀麦隆思想家姆本贝以其“非洲世界主义”论述成为当代非洲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在揭示独立以来非洲被迫嵌入世界的政治发展痼疾后，他呼吁非洲应以更自主的方式融入世界。为此，他梳理了20世纪多种非洲政治思潮中的短板，提出应扬弃差异哲学和受害者意识，倡导以更开放的“非洲世界主义”书写自身。从反思技术时代非洲移民赴欧受限入手，他提出带非洲传统伦理色彩的共享共通世界观，以替代技术中心主义的哲学根基。尽管带有一定局限，姆本贝以“世界”为主线的政治哲学在当代非洲思想版图另立范式，为中国学界研究非洲思想史和政治史带来新启示。

随着中非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持续走深走实，非洲哲学已进入国内学界的研究视野。近年，部分有代表性的人物和重大议题再次受到关注，如非洲哲学流派的鸟瞰式分类^①、政治领袖著作和言论的译介^②、知识分子的政论^③、史学流派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跨文化哲学视野下的非洲哲学研究与译介”(项目编号：20&ZD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邓皓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① 张宏明是我国学界最早讨论当代非洲哲学起源的学者，并对比利时传教士唐普尔的《班图哲学》和卡加梅的《比较班图哲学》分别进行专门研究。参见张宏明：《唐普尔的〈班图哲学〉及其对非洲哲学研究的影响》，《西亚非洲》1988年第6期；张宏明：《非洲“人种哲学”的先驱：卡加梅哲学思想解读》，《西亚非洲》2001年第4期。有关当代非洲哲学版图的综述，参见李安山：《当代非洲哲学流派探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0年第2期。

② 近年，中国对坦桑尼亚开国领袖尼雷尔(1922—1999)、新南非总统曼德拉(1918—2013)、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1937—)的著作或言论均有译介。参见尼雷尔：《尼雷尔文集》(共四卷)，韩玉平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曼德拉：《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谭振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奥巴桑乔：《非洲的民主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访谈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 参见南非学者莫列齐·姆贝基：《贫穷的设计师：为什么非洲的资本主义需要改变》，谭振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姆贝基：《变革的拥护者：如何克服非洲的诸多挑战》，谭振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刚果布学者阿兰·马邦库：《关于非洲文学的八堂课》，邹亚男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版。

理论贡献^①等。尽管没有使用“政治哲学”一词,但和其紧密相关的诸如国家构建、民族冲突、非洲与世界的关系等议题始终未离开过中国学者的视野。在较早时,他们已梳理非洲社会主义、民族主义、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变迁等政治思潮,并对有代表性的地区政治发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国别研究。^②在前人讨论基础上,本文拟从喀麦隆思想家阿契勒·姆本贝(Achille Mbembe,以下简称姆本贝)有关非洲政治哲学的“世界”转向入手,回顾他对非洲政治的阐释、批判和构想,评价当代非洲思想界领军人物带特定时代烙印的贡献和局限,以进一步丰富国内学界对当代非洲政治思想的认识。

一、生 平

姆本贝1957年出生于喀麦隆中部距首都雅温得不远的小镇,并在当地接受大、中、小学完整教育。其叔叔于1958年因武装反抗法国殖民统治遭枪决。小时候曾入读教会学校,为其批判性掌握天主教教义打下基础。大学时因论文选题涉及喀麦隆民族主义抵抗运动而无法举行答辩,故选择离开喀麦隆。1982年,赴巴黎深造,在法国的非洲研究学者指导下围绕喀麦隆50年代反法英雄恩优贝(Ruben Um Nyobé)撰写博士论文,并着手整理恩优贝遗稿。该博士论文及恩优贝遗稿随后即分别以《论喀麦隆的国家问题:

① 张忠祥:《20世纪非洲史学与史学家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

② 现列举中国学者研究非洲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参见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唐大盾等:《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保平:《传统与现代:非洲文化与政治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程迈:《坎坷动荡转型路:尼日利亚的宪法改革与教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舒运国:《泛非主义史:1900—2002年》,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周海金:《非洲宗教的传统形态与现代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路征远:《非洲统一组织研究:泛非主义视角》,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版;蒋俊:《非洲族群政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

鲁本·乌姆·恩优贝》和《恩优贝的游击手稿》^①在法国出版。20世纪80年代末,获资助赴美国多地从事研究。1988年,出版《难以驯服的非洲:论非洲独立以来的基督教、权力和国家》。^②1991年,与法国学者共同出版《自下而上的政治:论黑非洲的民主问题》。^③随后继续其年轻时对喀麦隆殖民史的关注,于1996年出版《1920到1960年喀麦隆南部的游击队:殖民地对理性的多种借用》。^④1996年至2000年,任非洲社会科学与发展委员会^⑤执行秘书。2000年,凭《论后殖民:当代非洲的政治想象》^⑥一书开始在英语学界打响学术声誉。2001年至今,定居南非,任约翰内斯堡著名学府金山大学当时新成立的社会与经济研究所教授。定居南非后,与该校南非籍文学研究学者结婚,两人常有合写文章。出于对南非种族隔离史及新南非政治发展的兴趣,2008年与妻子共同主编《约翰内斯堡:捉摸不定的都会》。^⑦延续其对非洲后殖民时期政治文化演变的哲学思考,于2010年和2013年分别出版《走出长夜:论去殖民的非洲》和《黑人理性批判》。^⑧随后,其思考焦点延伸至全球化背景下种族和技术反思,相继在2016年、2020年和2023年出

① Achille Mbembe, *Le Problème National Kamerounais: Ruben Um Nyobé*, Paris: L'Harmattan, 1985; *Ruben Um Nyobé, Ecrits sous Maquis*, Note et introduction de J.-A. Mbembe, Paris: L'Harmattan, 1989.

② Achille Mbembe, *Afriques Indociles: Christianisme, Pouvoir et Etat en Société Postcoloniale*, Paris: Karthala, 1988.

③ Achille Mbembe, Jean-François Bayart and Comi Toulabor, *Le Politique par le Bas en Afrique Noire*, Paris: Karthala, 1992.

④ Achille Mbembe, *La Naissance du Maquis dans le Sud-Cameroun, 1920—1960: Histoire des Usages de la Raison en Colonie*, Paris: Karthala, 1996.

⑤ 成立于1973年的非洲社会科学与发展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是非洲重要的人文和社科研究平台。

⑥ Achille Mbembe, *De la Postcolonie: Essai sur l'Imagination Politique en Afrique Contemporaine*, Paris: Karthala, 2000.

⑦ Achille Mbembe and Sarah Nuttall, ed., *Johannesburg. The Elusive Metropoli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⑧ Achille Mbembe, *Sortir de la Grande Nuit. Essai sur l'Afrique décolonisé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0; *Critique de la Raison Nègr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3.

版《敌意政治》《论野蛮》和《尘世上的共同体》。^①其大部分独著已被翻译为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在西方出版,并在非洲广泛传播。除独著外,姆本贝还在法国、美国和喀麦隆的学术杂志和报纸发表多篇重要文章。

从上述轨迹看,姆本贝在20世纪80年代以研究喀麦隆的去殖民史起家,随后深耕非洲现当代政治思想,于21世纪头十年在西方和非洲均获得声誉后转向关注技术议题,并开始在非洲多地组织培育民主精神的学术或民间活动。他于2011年被南非哲学家奥沙称赞为“最有突破性的五位当代非洲思想家”^②之一。先后于2018年和2024年在德国、挪威获表彰杰出人文研究贡献的布洛赫奖、亨克尔奖、霍尔伯格奖,且分别是这些奖项的首位非洲获奖者。近年逐渐与法国政界走近。自2016年起,受法国官方资助,在非洲国家举办多届“思想工作室”活动。2021年,受法国总统委托撰写法非关系报告。^③2022年,以法国代表团成员身份随法国总统对喀麦隆进行国事访问。

我国学界已留意姆本贝的“非洲世界主义”(Afropolitanisme)的理论贡献及其引起的争议,但更多从文学理论方面着墨。^④而姆氏从非洲人角度有关全球数字技术与权力两者关系的思考亦已被翻译成中文。^⑤在已有基础

① Achille Mbembe, *Politique de l'Inimitié*,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6; *Brutalism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20; *La Communauté Terrestr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23.

② 南非哲学家奥沙(Sanya Osha)认为,当代非洲哲学有五位突破性的思想家,分别为 Kwasi Wiredu(1931—2022)、Paulin Hountondji(1942—2024)、Valentin Mudimbe(1941—)、Kwame Appiah(1954—)、Achille Mbembe, 参见 Sanya Osha, *Postethnophilosophy*, New York: Rodopi, 2011, p.1.

③ 可在网上下载该报告全文,参见 <https://www.clysee.fr/emmanuel-macron/2021/10/07/remise-de-la-contribution-du-professeur-achille-mbembe-au-president-de-la-republique>, 访问日期:2024年8月17日。

④ 参见余静远:《非洲都市主义》,《外国文学》2024年第1期。余静远以“非洲都市主义”来翻译英文 Afropolitanism 一词容易引起读者误解,以为姆本贝的哲学思想与非洲大都会有关。事实上,正如余静远在文中所恰当指出,姆氏思想体现为一种独特的非洲世界主义。是故,本文使用“非洲世界主义”来翻译姆氏笔下的法文新词 Afropolitanisme。

⑤ 参见阿基里·姆本贝:《数字时代的去边界与边界化悖论》,吴万伟、洪成园译,《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7期。

上,本文拟以“世界”为主线,从三方面梳理姆本贝的政治哲学论述。首先,因应非洲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进一步被迫嵌入世界体系及步履蹒跚的国家发展,他分析了政治发展迟缓的深层次原因。其次,针对在泛非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现实困境,他提出一种既保留黑人特性、又强调黑人与世界交融的“非洲世界主义”。第三,鉴于非洲移民越来越受欧洲设置的高技术壁垒管控,他对当代全球技术的野蛮渗透进行了带非洲关怀的反思。回顾完他有关“世界”的分析后,我们将简要评价姆本贝的政治哲学,并略论其思想对中国学界的启示。

二、20世纪非洲的政治想象

如要理解姆本贝的政治哲学,须先理解其笔下频频提及的非洲政治发展和当代文化中的政治想象。只有理解民族主义、泛非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非洲语境后,我们才能公允地评价他对非洲政治的诊断及构建“非洲世界主义”的用心。比起曾在年轻时接受过殖民教育、并在独立后呼吁思想去殖民化的上一代思想家^①,成长于喀麦隆独立后进行国家建设时期的姆本贝更敏感于非洲人如何运用权力及其背后的哲学预设。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非洲的政治想象。

历史地看,受欧洲殖民统治和宗教渗透的非洲大陆一度难有政治想象的主体性可言。在殖民时期,有关治理非洲的构想和知识绝大部分出自欧

^① 在这里,我们按出版年份顺序列出四位主张思想去殖民化的非洲知识分子及其标识性著作,参见 Okot P'bitek(1970), *African Religion in Western Scholarship*, New York: Diasporic Africa Press, 2011; Fabien Eboussi Boulaga, *La Crise du Muntu. Authenticité Africaine et Philosophi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1977; Kwasi Wiredu, *Philosophy and an African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Nguni Wa Thiong'o, *Decolonis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London: James Currey, 1986。

洲人之手，其内容之广泛庞杂，被后来非洲学者称为“殖民图书馆”。^①以在非洲影响力最大的英、法殖民统治为例，对非洲当地治理一般有学界所公认的“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和“直接统治”（direct rule）两种思路。顾名思义，间接统治是英国殖民者通过与当地已有权力结构合作、以较低人力物力进行统治的策略^②，而直接统治则是法国殖民者对当地高度控制、试图以宗主国体系同化当地的策略。^③虽然英法均在个别地区设立学校、培育精英，但由于殖民思路和参政制度不同，20世纪上半叶英法殖民地的政治精英有着泾渭分明的政治想象。

对于接受英殖民教育的一批非洲精英来说，无论是当时在黄金海岸努力促成自治殖民地走向独立的丹夸（Joseph Danquah）、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和布西亚（Kofi Busia），抑或是年轻时已为肯尼亚基库尤人权益奔走的肯亚塔（Jomo Kenyatta），还是致力于坦噶尼喀独立的尼雷尔（Julius Nyerere）和在南部非洲多地从事解放运动的卡翁达（Kenneth Kaunda），脱离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主权国家是他们不容置疑且须尽快实现的政治诉求。尽管有着独立后选择的东西意识形态之分，也有激进与温和之别，还有围绕构建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的排序先后之争，但成长于英殖民地的政治领袖和活动家均高举在政治上独立于前殖民者的民族主义旗帜。反观受法国同化政策下成长的政治精英，尤其是如布莱思·迪亚涅（Blaise Diagne）、桑戈尔（Léopold Sedar Senghor）、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等进

① Valentin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Order of Knowled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88.

② 关于英国在非洲殖民地的治理模式，参见杭聪：《英国殖民统治与尼日利亚的早期工业化》，《历史教学问题》2023年第6期。

③ 应该指出，英、法两国在非洲的治理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并不完全遵照间接统治和直接统治之别。英国对当地亦有一定程度的同化，而法国亦在某些地区倚重当地统治首领。关于法国在非洲殖民地的治理模式，参见贺鉴、惠喜乐：《法国宪法对非洲法语国家的影响》，《法国研究》2022年第3期。

人法国国民议会的黑人议员,他们更倾向在现有制度内跟随法国,以渐进方式提高殖民地福祉,故一度没有以抗争姿态提出国家和地区独立的声音。除塞古·杜尔(Sekou Touré)、法农(Frantz Fanon)坚持与法国殖民者决裂外,大多数非洲精英更愿意和前殖民宗主国在政治上藕断丝连。至于在20世纪40年代诞生于巴黎、以提振黑人文化为己任的“黑人传统精神运动”(Négritude),更多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彰显黑人的种族身份,发出黑人被欺压、被遮蔽下的呐喊,其影响力在当时没有抵达非洲本土,故远不及在英、葡非洲殖民地先后燃起的大规模民族主义运动之激动民心。简言之,作为非洲政治思潮重要一脉的民族主义在前英国殖民地的去殖民解放生根发芽和在独立国家建设时期发扬光大,而未能以鲜明方式存在于独立后非洲法语国家。

事实上,对黑人问题进行系统思考并予以阐释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世纪加勒比海、美国等海外非裔的政治意识觉醒。有感于西方“殖民图书馆”对非洲的压倒性叙事和知识体系,自19世纪末起,布莱登(Edward Blyden)、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加维(Marcus Garvey)等先后以各自方式塑造海外非裔、乃至部分非洲本土人的泛非意识,可谓是“泛非主义”之滥觞。经恩克鲁玛、尼雷尔等第一代非洲国家领袖接力推动,从20世纪上半叶在各殖民宗主国内举行五次泛非会议到非洲60年代初大多数国家独立后相互协商和妥协,以非洲彻底解放和实现地区联合为目标的非洲统一组织终于在1963年落地。它的成立是海外非裔和非洲英属殖民地精英前仆后继的里程碑,也是非洲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果实。这一组织在随后三十多年间在地区整合、支持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非洲国与国冲突斡旋等方面发挥过一定正面作用。1994年新南非诞生后,南非主动担当起“非洲复兴”的重任,并与其他国家一道对非统进行制度改良,客观上使“泛非主义”以非洲联盟的新政治面貌出现在21世纪。随着非盟在当代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高,有关泛非主义的学理讨论亦不断深化拓展。

除主张跨国团结的泛非层面外,非洲多国在20世纪60年代甫一独立,便开启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去殖民自主探索道路。大体而言,各国政治道路是非洲人根据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作出的自主探索。其中,为我国学界深入研究的政治思潮是60年代至80年代一部分国家的社会主义探索。除前述恩克鲁玛的加纳和尼雷尔的坦桑尼亚外,还有刚果(布)、埃塞俄比亚、贝宁、布基纳法索等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程度借鉴苏联治国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实践。而同一时期在与西方关系较为密切的科特迪瓦、肯尼亚、喀麦隆乃至蒙博托治下的刚果(金),政治领袖则更倾向于家长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此外,受传统部族关系及殖民统治影响,诸如尼日利亚、卢旺达、布隆迪等国自独立起便面临全国范围的部族冲突困扰,且卢、布两国的问题随后更是在90年代积聚爆发,演变成大规模仇杀。再者,部分以集权方式进行统治的文官国家遭遇军人夺权,如布基纳法索、贝宁、尼日利亚等国更是反复出现军事政变。加上自70年代末起国际市场对多种原材料需求下降,许多内政处理不善的非洲国家在80年代预算失衡、国库亏空,于是只好无奈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条件的贷款援助。遗憾的是,国际组织为非洲开出的削减公共支出、放松对进出口管制、对国企私有化等药方,反而恶化了绝大部分国家原本已走下坡路的社会经济状况,进一步降低80年代末、90年代初非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性,客观上为90年代上半叶的民主化作好了铺垫。

不应忽视的是,20世纪80、90年代非洲的政治想象既有非统强调自力更生、但未曾落实的《拉各斯行动计划》及学理上由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提出的与世界体系“脱钩论”,又有内外受压、短时间内席卷全非的民主转型。在这里,大体由执政者驾驭主导、且有反对派和社会大众参与的民主转型是非洲自独立以来最深刻的政治探索。^①虽然这一转型确有内部条件

^① 有关我国学者对非洲民主转型的整体评价,参见张宏明:《非洲政治民主化历程和实践反思》,《西亚非洲》2020年第6期。

不完全成熟、外部施压促变的时代背景，但从政治多元角度回顾，大多数国家以竞争性的民主程序进行立法和总统选举，且在制度上初步建立了相互制衡的国家权力机关，告别了七八十年代的专政和独裁，故其民主转型在整体上是值得肯定的。同时，自民主化开启以来，激进、统摄性的社会改造方案已淡出非洲人的政治想象。占据他们思考焦点的，更多是民主巩固期间政治反对派受打压、言论自由受限制、权力的庇护与交易等深层次问题。姆本贝对非洲政治的深层次反思亦始于这些民主化未能及时根除的痼疾，并溯源至整个 20 世纪的各种非洲政治思潮。

三、批判被动嵌入世界的非洲政治

在姆本贝看来，在非洲大陆独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尽管不少国家在冷战和不结盟运动的全球背景下选择不同的政治道路，但整体而言，大多数国家非但仍然无法摆脱与国际体系的被动联系，而且还进一步稀释自身行政能力。它们或是将关键领域的国内主导权让渡给外国，或是默许把某些本应正规运作的社会经济职能转移到非正规实践中。相较于殖民统治时期全然由西方人主导的资源出口模式，独立后的非洲政治精英深谙控制当地资源的重要性，进而主动掌控地方、国家和国际三者网络间的中介地位，借此维持自身利益。在这里，“国际”并不单指前殖民宗主国，而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经济体系。与此对应，本土政治精英所赖以存在的空间，则更接近这一体系中一块块与周边关系不大的非洲飞地。姆本贝看到，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起，就连法国这一曾深度介入独立后非洲法语国家政治与社会的国家也渐渐无力完全操控那些前殖民地，只好眼睁睁看着它们沦为实力更为雄厚的国际组织的围猎目标。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非洲国家要以削减公共开支、贸易自由化的方式维持主要宏观经济平

衡,以获得这些组织的贷款。为此,姆本贝评价道,“20世纪末的主要政治事件是非洲国家丧失独立和主权,且鬼鬼祟祟地屈服于国际债权人”。^①可以说,独立后的非洲再次被动嵌入世界,是姆本贝对非洲政治发展的整体判断。

事实上,相较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所带来的分野,姆本贝更强调非洲独立以来持续不断的民主意识缺失。无论是独立后宣称要走自力更生、类似社会主义路线的坦桑尼亚,还是坚定走家长式亲西方路线的科特迪瓦、喀麦隆,无论是文官政府还是军人政权,这些政治探索都以凝聚国家、防止族群分裂为名,过于整齐划一;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转型后,多党制和市场经济却没有带来民主模式的自动过渡,很多国家仍没有从根本上体认“个人是理性的公民,能够为自己做出独立的选择;肯定个人自由和与之相关的权利”等自由民主的哲学核心。^②在他看来,这样的民主徒具形式,尚无以那些核心观念为基础,且深入百姓的政治文化。和独立以来前二十年部分国家所采取的左翼激进探索相比,9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固然告别了宏大激进的社会革命,但政治领袖或其家族仍以代际方式长期独揽大权,以发展为名行常态化掠夺之实,造成社会阶层固化,普通百姓渴望到西方国家生活。在这里,姆本贝借用法国思想家巴塔耶的“耗散”概念,指出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国家统治有着更为细化分散的权力,这些权力“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生产和繁衍生命本身的可能性,损耗老百姓的物理躯体和生活质量只是为了更好控制浮动资源的流动”。^③如此一种耗费巨大的管控却并无崇高的政治口号,仅是针对个体生活和社会生产,为了管控而管控。同时,他借用并深化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概念,提出非洲百姓的日常生活有许多类似战时的元素,越来

① Achille Mbembe, *De la Postcolonie: Essai sur l'Imagination Politique en Afrique Contemporaine*, p.108.

② Achille Mbembe, *Sortir de la Grande Nuit. Essai sur l'Afrique décolonisée*, p.206.

③ *Ibid.*, p.187.

越像“一场充满控制、威胁和动员的战争”。^①在这场渗透到日常各方面的战争中,无论是公权力的蛮横,还是私人势力的粗暴,都有普遍失控的风险,很容易导致国家解体。^②

姆本贝对非洲政治的分析一部分来自其祖国喀麦隆在 90 年代初的民主转型阵痛。在该国启动民主化不久,部分地区发生长达半年的“死城”运动,反对派通过示威罢工、抵制政府行政管理等瘫痪城市正常社会秩序的手段,试图争取国家对这些地区倾斜更多财政资源。这一高烈度暴力对抗形式在当时非洲普遍较为平稳的民主化过渡中可谓绝无仅有。对此,时任总统采取铁腕措施镇压,同时分化各反对党,并在 1992 年颇受争议的首次多党竞选中获胜。对此,姆本贝在 1993 年分析到,在经济严重紧缩、国家财政匮乏和国际贸易交往严重下降的背景下,喀麦隆总统力图以强硬手段“重新部署以前整合在一党制内部的互惠、福利和补偿网络”,并以“影子经济”的方式控制国家。这一得到西方支持的小型统治集团无非是以多党制和形式上的法治国家对人民进行胁迫和掠夺。^③

在更广泛意义上,姆本贝认为非洲民主化步履蹒跚的原因有二。第一,人民愈发被政治经济结构排除在外。在他看来,即使结束了长时间残酷的集权统治,非洲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却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残酷的政治经济学,催生出越来越多在自己国家中的陌生人、局外人。或是出于同一国家内部的本土与外来的对立情绪,或是出于不同种族的相互仇视,或是出于无法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源和无法承受高昂的生活成本,一部分人产生了被遗弃的主观感受,于是通过向西方移民偷渡或在本国违法犯罪的

① Achille Mbembe, *Sortir de la Grande Nuit. Essai sur l'Afrique décolonisée*, p.193.

② Achille Mbembe, *De la Postcolonie: Essai sur l'Imagination Politique en Afrique Contemporaine*, p.96.

③ Achille Mbembe, *Crise de légitimité*, in *Itinéraires d'Accumulation au Cameroun*, ed., Peter Geschiere and Piet Konings, Paris: Karthala, 1993, pp.372—373.

方式摆脱窘境，客观上使人民逐渐远离民主。第二，随着国家职能的弱化、乃至在部分领域的解体，公开规则 and 标准得不到遵守，往往让位于大量非正规化的组织。姆本贝强调，“非正规化不再仅局限于经济方面和生存战略，它们还逐渐成为普通人文化和政治想象的主要形式”。^①可以想见，在这种扭曲的政治文化中，人们将不得不追求短期和即时的非正式安排，仿佛每时每刻都在重新谈判和订立临时协议，从而牺牲了中长期的筹划。在这两点共同作用下，非洲人的政治想象空间越来越逼仄，只愿把政权组织形式视为一场“长期的内战”。^②如此一来，非洲人的最高政治愿景，便无非是占据世界体系中的某片非洲飞地，扮演全球体系中某个隐秘同谋，利用国际社会对非洲的冷漠来维持自身统治。

我们不禁要问：如何摆脱这种只有微弱经济增长、但毫无政治发展的落后状况？如何在颓势重新掌握非洲的主体性？如何根据新形势重新界定非洲与世界的关系？作为哲学家，姆本贝给出了独特的思考线索。他鼓励非洲人应把被动变为主动，在嵌入世界的现有基础上积极主动和世界合作，利用好世界给予非洲的支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把非洲民主化的问题进行“国际化”，寻求“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团结和支持”。^③而这一切的认识基础，便是其作品中频频出现的“非洲世界主义”。

四、超越差异哲学和受害者意识的“非洲世界主义”

殖民时期的西方总弥漫一股“非洲人无法自立自理”的成见，并借此为

① Achille Mbembe, *Essai sur le Politique en tant que Forme de la Dépense*, Vol.44, *Cahier d'Etudes Africaines*, 2004, p.164.

② Achille Mbembe, 50 ans de Décolonisation Africaine, Vol.30, *NAQD: Revue d'Etudes et de Critique Sociale*, 2013, p.141.

③ *Ibid.*, p.144.

其长时间在非洲当地进行资源开发和文教开化辩护。连部分非洲人都更愿意相信前殖民者,认为跟随西方才能实现富强。例如,那位终其一生都紧跟法国的科特迪瓦国父乌弗埃·博瓦尼在20世纪50年代末民族解放运动呈燎原之势时甚至向刚刚取得独立的加纳下赌约,看到底是像加纳、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等独立主权国家发展得好,还是像科特迪瓦以自治形式加入法兰西联邦共同体的政治实体发展得更好。可以说,非洲人能否建设政治上的独立共同体,这始终涉及他们如何看待自身和西方的关系。对于那个曾带来跨大西洋奴隶贩卖和在本土进行殖民的西方,非洲政治哲学应如何安放它的位置?如何安放西方,其实也就是如何发挥政治想象力书写非洲自身。这便是姆本贝的切入点。他在2001年和2006年分别以《论非洲的自我书写》和《非洲世界主义》两篇极具分量的文章,提出其试图超越前人的政治哲学。

姆本贝以一种新眼光来重新打量自19世纪以来先后由海外非裔及非洲本土政治家、思想家有关解放和民族自决的论述。这些论述往往旨在提振黑人的政治和文化主体意识,不少还呼唤在全球文明意义上的黑人崛起。对此,姆本贝在肯定这些论述的积极意义之外,提出它们未曾明言的两大根本预设:一是某种长期遭受欺凌的受害者意识,一是某种对黑人文化独特性的自我宣示。很容易看出,刻意塑造黑人特性并沉溺于这种特性,这两大预设都直接或间接以西方为思想靶子。它们随后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政治语境下被填充放大,既存在于滥觞于海外非裔的泛非主义,也存在于发轫自巴黎的那场“黑人传统精神运动”,还以各种意识形态变体存在于独立后近三十年非洲多国的政治实践中。

具体来看,关于受害者意识,姆本贝指出,非洲人往往把祖辈和自身遭受过的苦难视为一系列无法改变的宿命。是故,对许多非洲人来说,既然无法改变宿命,那么便应抛弃这个由西方施暴者主导的世界,断绝与西方的联

系。于是，非洲今后的历史进程，就应该是受害者和施暴者分道扬镳的进程。用他的话来说，“恰是这种对世界的拒绝，掩盖了非洲人对认可和复仇的强烈渴望和对历史的阴谋式解读，它被作为解放和自我赋权的激进话语，即所谓非洲性政治的基础”。^①

至于关于黑人文化独特性的自我宣示，姆本贝指出这一宣示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种族主义。确切来说，它是针对黑人种族的不同偏见所作出的种族反应。于是，提倡黑人文化特性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仍未走出“种族”这一西方首先提出的分类。在这个意义上看，就连五六十年代曾主张黑人文化和西方文化互补互鉴、协同进步的塞内加尔国父桑戈尔也如姆本贝所诊断，美其名曰黑人和西方是“给予与接受的交汇”，看起来仿佛是以黑人的天分和才华来丰富西方文化，实则依然自恋于黑人的差异特点。而从那些更为学理的非洲本土史学论述来看，独立后曾一度引人注目的伊巴丹学派、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和达喀尔学派亦大致服膺于强调黑人文化独特性的史观。为此，姆本贝评价道，“民族主义史学将从过去的非洲帝国，甚至法老时代的埃及，寻找缺失的储备”。^②

事实上，在当代非洲哲学界，围绕上述两大预设，多位思想家均有涉及非洲身份界定的论述。这些论述或自觉深化上述预设，或对之补充，或设法将其推倒，或以之为戒、刻意回避。其中，姆本贝重点分析了两种颇具影响力的论述。第一种论述以1988年刚果金思想家瓦伦丁·姆丁贝(Valentin Mudimbe)的《非洲之发明》为代表。该书尝试解构近现代涉及非洲的知识

^① Achille Mbembe, “A propos des Ecritures Africaines de Soi,” *Politique Africaine*, Vol. 77, 2000, p. 25. 这篇发表于世纪之交的长文是姆本贝全面阐释20世纪非洲各政治思潮之短板的最重要论述。

^② Ibid., p. 28. 在这里，姆本贝含蓄表达了他不同意塞内加尔学者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有关古埃及的黑人起源假说及其在非洲种族同源方面的引申。有关谢赫·安塔·迪奥普的学说及其政治引申，参见刚果学者若泽·多·纳西门托：《谢赫·安塔·迪奥普的政治思想》，李洪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

传统,即解构有关非洲的种种“发明”。在这里,“非洲”既包括本文开篇所提及的那个由西方殖民者进行知识建构、收录于“殖民图书馆”的非洲,也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众多海外非裔以拳拳之心力图恢复荣耀的那个祖籍地,还包括那个由本土人驳斥殖民知识话语的正统非洲。姆本贝固然理解这一知识解构背后的苦心,但他提醒这一派论述所隐含的危险苗头,担心在过分解构的眼光下,任何一种对非洲的论述都将被等而视之,被认为无非是一家之“发明”,如他所言,“在非洲特性和传统问题上,难以区分原版和复制品,甚至无法区分仿制品”。^①

第二种论述以20世纪90年代移居美国的加纳思想家阿皮亚(Kwame Appiah)的“世界主义”为典型。恰是出于对某种僵化、前定身份的警惕,阿皮亚试图为包括海外非裔在内的广义非洲人构思出一种并无事前沉淀、一切有待生成的身份。按照阿皮亚的设想,西方主导的世界本身不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张有待非洲人自己去编织的关系网络。同时,非洲也不再具有本质化的特性。倘若单从术语上看,阿皮亚的世界主义思路似乎与姆本贝的“非洲世界主义”颇有重叠。不过,姆本贝客气指出加纳同行的不足,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并选择属于他的非洲身份”。^②在他看来,阿皮亚的世界主义是对上一代黑人本质化的短板矫枉过正。它容易导致非洲人的身份虚无。

姆本贝的思想努力在于扬弃刚果金和加纳同行的两种自我论述。在他看来,无论是姆丁贝对任何涉及非洲的体系性论述的解构,抑或是阿皮亚看

^① Achille Mbembe, “A propos des Ecritures Africaines de Soi,” *Politique Africaine*, Vol. 77, 2000, p.30.

^② Ibid., p.31. 我国学界已译介阿皮亚多部著作,参见奎迈·阿皮亚:《荣誉法则:道德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苗华健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苗华健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认同伦理学》,张容南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阿皮亚在英语哲学界打响名声的关键著作,参见 Kwame Appiah, *In My Father's Hou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似对黑人本质化的刻意回避，都仍然没有彻底厘清非洲和西方乃至和世界的身份关系。两种论述都暗自期待在西方人这个曾经的施暴者身上“产生内疚和忏悔的效果，同时小心翼翼避免对非洲人自身的批评”。^①而且，它们都没有对之前强调差异的哲学进行严肃批判，要不仅仅对之解构，要不干脆对之回避。如此一种默许，其实无助于阻止非洲人对差异的迷恋和执着，导致他们看不到自身与其他人有着相似的历史进程。再者，在只瞄准黑人与西方人之间的差异之际，人们往往忽视了非洲人内部的差异，诸如非洲本土各族群间不对称的关系、本土非洲人与海外非裔的差异等。最后，过分强调对过去贩奴运动和殖民的苦难记忆，很可能也会分散人们面对当下现实挑战的勇气，客观上把非洲人进一步引向更为扭曲的受害者意识。

姆本贝在 21 世纪初撰文猛烈抨击 20 世纪非洲政治哲学的短板，其理论反思带有自身迁居到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亲身观察。站在倡导和解、宽容、原谅的南非看整个非洲大陆，姆本贝认为急需纠正那种已形成惯性，并深入各地非洲精英的受害者意识。以其定居的约翰内斯堡为例，他认为该市的当代史已鲜明体现出一种“非洲世界主义”。它既有种族不平等历史，也有这段历史在后种族隔离时期的沉淀和重塑；它既有南非的本土黑人，也有许多其他非洲国家慕名而来的劳工；它既与世界接驳，也是南部非洲的枢纽。用姆本贝为其《约翰内斯堡：一座难以捉摸的都市》作序的原话来说，约翰内斯堡“难以捉摸，没有一个确切的定型。它具有多重身份：非洲人的（或许根本不是，或不够‘非洲’）；欧洲人的（或许不是，或不再是‘欧洲’）；甚至是美国人的（由于它植根于商品交换和消费文化）”。^②

① Achille Mbembe, “A propos des Ecritures Africaines de Soi,” *Politique Africaine*, Vol. 77, 2000, p.31.

② Achille Mbembe and Sarah Nuttall; Introduction, in *Johannesburg. The Elusive Metropolitan.*, p.25.

恰是约翰内斯堡,乃至新南非所呈现的杂糅、混合、未定型等特性为姆本贝的政治哲学提供了现实素材。在他看来,整个非洲大陆的种族意识正在发生变化,非洲国与国之间的人员往来越来越频繁,非洲和域外其他地区也越来越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独立后非洲史学理论上曾引起轰动的种族同源论亦逐渐失去市场。用他在《非洲世界主义》短文中的描述,“许多非洲人并不定居在非洲,或者说,不少非洲大陆里的非洲人出于自己的意愿主动选择不在自己出生的国家里定居;不少人可以同时体验到完全不同的时空,穿梭在不同国度,他们敏感于时代的变迁”。^①对这批具备跨国界文化的非洲人,姆本贝把他们称为“非洲世界主义者”。

必须指出,和西方思想中的世界主义类似,姆本贝的世界主义也不建立在某一固定类别的精神或生理特性中。它不能被还原到基于血缘、种族、地理的秩序,甚至也不能被认为是某种习俗,因为在他看来,就连习俗也处于长时段的重塑过程,可以与时俱进地调整。与此同时,姆本贝绝非无视非洲人曾遭受的残酷与痛苦。他深知非洲与西方在悬殊的军事、技术、经济、政治力量对比中曾一度落后被动,但至少在哲学认知层面,他以“非洲世界主义”宣告一种重新面向世界的胸襟:“这一切,哪怕算不上文化交融,那起码也属多个世界的相互交织。在此过程中,确有一些交织由不得我们作主,我们有时也不得不生硬地与之共舞,但无论是好是坏,现在我们总算驾驭了它们,使它们为我们所用。”^②与上一代主张以暴易暴的法农不同,他在积极吸收法农建立非洲主体性的基础上,敏锐地识别出全球化时代非洲有可能把握的突破机会,扬弃非洲民族解放年代那种好斗的对抗性。可以说,放下对抗的怨恨和渲染黑人文化的执念,主动拥抱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是姆本贝

① Achille Mbembe, “Afropolitanism,” *Africultures*, Vol.66, 2006, p.15.

② *Ibid.*, p.13.

含蓄表达“既要继承法农、亦要反对法农”^①的着眼点，也是“非洲世界主义”的主旨所在。

五、反思世界范围内的技术

在西方，对技术的反思已构成频繁讨论的当代哲学议题，且为我国学界熟知。而身处技术上相对落后的非洲，本土思想家能捕捉到技术时代的哪些特点？在姆本贝看来，21世纪非洲的主要社会斗争将集中于政治制度变革、自然资源开采、财富分配以及人员流动这四方面。而在21世纪前二十年，非洲的人口流动问题最为迫切，因为这关乎“是否有能力释放流动的力量，是否有能力塑造领土和空间，使其人民能够尽可能频繁、尽可能远、尽可能快地流动”。^②无疑，这一论断与21世纪以来大批穿过地中海、试图在欧洲寻求生计的非洲移民和难民相关。而姆本贝对人类日益掌控全球的技术进行批判的触发点，亦恰是近年欧洲以安全为由布下类似战争形式的技术铁幕。

姆本贝在《敌意政治》第一章中列出当代四大特征，我们不妨概述如下：第一，大规模人口的移民和世界地理空间距离的缩小；第二，随着人类技术进步而出现的数字主体，反过来倒逼人类对生物、生态进行重新定义和价值重估；第三，在算法和机器在社会广泛使用的背景下，数字生活和真实生活的界限已难以区分；第四，施加在人类生理和生活方面的技术力量与资本的

① Achille Mbembe, *Critique de la Raison Nègre*, p.244. 有关姆本贝对法农在当代意义的详细阐释，参见其为法农全集2011年版的序言 Achille Mbembe: Preface, in Frantz Fanon, *Oeuvre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1.

② Achille Mbembe, “Purger l’Afrique du Désir de l’Europe,” *Le Débat*, Vol.205, 2019, p.100.

联系越来越紧密。^①在这一技术新时代,哪怕声称尊重个人的民主国家也能够以更隐蔽的方式向入侵者、弱小者、外来者等施加暴力,巩固种种安全管控手段。这便是和平年代的技术野蛮。而且,在他看来,算法作为一种全球基础设施的诞生,从时间上也巧合于西方要处理外来者这类“多余人口”的关头。如第三部分所梳理的,在全球新自由主义影响下,那些进一步被嵌入世界的非洲民族国家已解体为一块块相互分裂、但和全球体系保持紧密联系的飞地。在这种日益分隔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中,域外强国或本土强权对非洲百姓的追踪、定位甚至清除的手段将进一步加强。他把这一令非洲人最易受损害的技术野蛮称为“世界演变的黑人化”(le devenir-nègre du monde)。^②

那么,如何对抗野蛮时代人的物化和物的人化?姆本贝认为,要超越自然和人工的张力,就必须在认识上摆脱西方形而上学的陷阱,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此,传统非洲的万物有灵观可以替代西方以人为中心、放任人对技术发展的伦理观。他从包括西非多贡人在内的多个非洲传统宇宙论受到启发,指出非洲既是一股节制的力量(une puissance en réserve),又是一座充满力量的宝库(un réserve de puissance)。^③在这里,说它节制,是因为相较于西方人对自然越来越膨胀的驾驭欲而言,非洲传统宇宙论更偏重人和自然的相处,而非前者对后者的掌控;而说它充满力量,是因为大自然的力量和精神会赋予这一体系中的众生以生命力,且这一体系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生成状态,并向不可预见敞开。^④

在早年提出的“非洲世界主义”基础上,亦继承并发扬了法属马提尼克当代作家格里桑(Edouard Glissant)的“整全世界”观^⑤,姆本贝进一步提出

① Achille Mbembe, *Politique de l'Inimitié*, chapter 1.

② Achille Mbembe, *Brutalisme*, p.190.

③ Achille Mbembe, *La Communauté Terrestre*, p.201.

④ Ibid., pp.86—87.

⑤ Edouard Glissant, *Traité du Tout-Monde*, Paris: Gallimard, 1997. 有关格里桑“整全世界”概念的阐释,参见刘成富:《爱德华·格里桑“世界性”文化身份理论探寻》,《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6期。

“尘世上的共同体”(communauté terrestre),力图以人和物混融交互的生态伦理观从根本上取代技术对人和自然的压倒性统治,并借此呼吁西方结束对非洲人的流动限制以及对全球环境的榨取开发。在《尘世上的共同体》中,他将地球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环环相扣、边界模糊的整体。这一整体是为人类、动植物、自然界和人造物等众生而存在的。在这里,与其说众生有着某种共性,还不如说它们有着某种“共享共通”(en commun)、休戚相关的关系伦理。这一伦理更强调人与人相互依存的纽带,更关心事物或实体之间的联系,因此不同于贯穿几乎整个20世纪非洲哲学中的身份、差异和他者哲学,也不同于“那种致力于整齐划一的抽象世界主义和保留某片封闭角落的伪世界主义”。^①也恰是出于对纽带和联系的珍视,人们才有驱动力去修复那些受歧视、受限制的关系,去还原被破坏、被恶意占有的大自然。

六、评价和启示

本文以“世界”为主线,分别梳理了姆本贝对非洲被动嵌入世界的政治分析、对20世纪非洲政治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对技术时代的反思和建言。尽管仍有如其在2010年参与法国学界的后殖民争论、2020年在德国学界围绕犹太人问题引起争议、2021年应邀为法国总统撰写法非关系报告,乃至对当代非洲小说的阐释等题材值得挖掘,但限于篇幅,我们已呈现姆本贝在当代非洲哲学界最重要的面向,并按其著作出版的年份顺序及内在逻辑回顾了既相互联系、又逐步深化的三大焦点。

现在,我们来评价姆本贝的贡献。首先,他对非洲政治思想告别宏大社会改造方案的判断是准确的,对非洲政治和经济被动嵌入世界的研判也大

^① Achille Mbembe, *La Communauté Terrestre*, pp.83—84.

致成立。以今天的眼光视之,非洲在经历了民主化和新南非成立后已基本不再在政治层面提出新的宏大叙事,而是试图在世界体系中务实寻求发展机遇。尽管非洲自20世纪90年代较为平稳地确立了民主化,但姆本贝透彻看到民主化仅是政治发展的其中一方面,其他诸如腐败、裙带关系、族群矛盾等问题仍是影响非洲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绊脚石。对此,也没有提出解决症结的具体对策,但作为思想家,他在世纪初提出非洲应主动拥抱世界的思路本身便是“非洲世界主义”的政治引申。

其次,难能可贵的是,姆本贝恰当地指出了泛非主义、民族主义和非洲社会主义这三大思潮中对差异的过度强调和某种受害者意识的过分渲染。扬弃贯穿20世纪好斗的差异哲学和颇具怨气的受害者心态,这是姆本贝为我们提供观察非洲政治哲学的一种新批判角度,亦为非洲人建设性开展与域外国家的交往、积极融入全球舞台提供一种较为温和务实的认知基础。应该承认,如果在21世纪的新全球格局里再继续一味强调种族、民族或文化上的独特性,那么非洲政治哲学难保不会有僵化和过时之虞,丧失对独立后某些错误路线的应有反省,进而丧失对非洲发展的思想引领。事实上,相当一部分非洲独立后走的弯路确有差异哲学作祟的影子。例如,第一代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恩克鲁玛、尼雷尔虽有着值得肯定的自力更生努力,但在坚决与前殖民者划清界限的对抗思路下出台的具体治国措施的确有过激、过快的弯路。又如20世纪70年代刚果(金)、乍得、多哥等国则曾一度发动所谓“回归非洲文化本真性”的运动,以行政令的方式在城市命名、公民姓名、衣着服饰等方面恢复被殖民者抹杀了的传统非洲习俗,其实质却往往是强化党民合一的统治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看,姆本贝的“非洲世界主义”无疑有助于非洲人转变思路,以面向未来的积极态度参与全球分工和国家建设中。可以说,超越种族、民族和文化的边界,超越国家和大陆的边界,这既

是姆本贝力图替代旧思潮的理论愿景，也是一部分游刃有余的非洲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现实。就其内容来看，“非洲世界主义”另开炉灶，大力提倡非洲人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文化多样性和动态的交融性，它尤其重视散居非洲本土以外的黑人的经历，鼓励他们主动充当多种文化和影响的交汇点。这是他对长期受解放话语影响的非洲政治思想开出一味清醒剂，为非洲的自我书写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最后，沿着对差异身份的批判路数，并带着对近十年非洲移民赴欧受挫的现实关切，姆本贝从更广阔的视野打量当代技术世界对人类、尤其是对非洲人的影响。他准确地看到，破除差异哲学，或者不轻易滥用差异，这不仅是非洲人在观念上的紧迫任务，而且还是西方技术强国转变对非态度的前提。事实上，包括姆本贝在内的大量非洲学者在评论欧洲限制移民问题时，往往从尊重个体的人道角度出发，呼吁西方放松乃至取消对非洲人的流动限制，避免地中海成为一片巨大的“海上墓地”。平心而论，为非洲移民发声，这在非洲当代学者中并不稀奇。姆本贝有比同侪更胜一筹的地方，其实在于把对技术的思考重点延伸至全人类的伦理观，并点明非洲传统伦理观对当下的启示。要知道，在当代非洲哲学版图中，他是为数不多对全球生态进行系统政治思考、并调动本土资源的哲学家。在近年的三部曲中，姆本贝呼吁世人不能再从分裂和排斥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应从相互依存和共同生活的角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以巨大的理论抱负力图盘活非洲传统伦理，使之成为破除技术中心主义的解药。这是他在伦理观上的贡献。

行文至此，我们也应指出姆本贝思想的一些局限。可以说，他的局限恰蕴藏在其“非洲世界主义”的理论亮点中。现实来看，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这批移居国外的非洲人大部分是各阶层的精英和全球化的受益者，因此“非洲世界主义”恐怕只适用于少数人，难以在数量庞大、始终生活在出生国的非

洲人中形成共鸣。生硬地强调非洲人穿越在欧、美、非三个大陆的流动性和混杂性,反而会加剧非洲沉默大多数的主观剥夺感^①,进而加重他们对国家、对全球化的怨恨以及对差异的执着。而且,“非洲世界主义”与之前泛非主义、民族主义的切割过于彻底,很可能会渲染一种空洞、无根的非洲世界公民心态,既难以有效为现实中的非洲各国提供治国理政的发展基础,也不容易说服那些已接受逾六十年国家独立价值灌输的非洲百姓。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忽视民族国家和主权边界的“非洲世界主义”是去政治化的。它更偏向一种学院书斋式的历史观和审美观。如果以它来完全取代民族主义和泛非主义,那么这倒很可能与姆本贝自己所反对的新自由主义形成共谋接驳^②,反而让政治经济自主性极为薄弱的非洲进一步深陷新自由主义的桎梏。

综上所述,姆本贝的贡献和局限对中国学界可以有以下启示。在哲学研究层面,我们应重视当代非洲思想的主体性。哪怕包括姆本贝在内的非洲学者在学术训练、写作动机、著作传播、对话研讨等方面仍有西方挥之不去的影子,但独立后多种非洲政治思想均致力于努力构建适应非洲传统文化和现实发展需要的自主体系。我们应注重从非洲人的内部视角看非洲,重视他们的问题意识。在政治研究层面,我们应以客观务实的态度深入研究非洲独立后不同时期政治发展的特点。也许我们不完全同意姆本贝的

^① Emma Dabiri(2014), Why I'm not an Afropolitan, <https://africasacountry.com/2014/01/why-im-not-an-afropolitan/>, 访问日期:2024年8月17日。有关姆本贝“非洲世界主义”在整个非洲政治思想脉络中的评价,参见 Albert Kasanda, *Contemporary African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chapter 8。有关英语学界从非洲文论角度批判“非洲世界主义”的梳理,参见余静远:《非洲都市主义》,《外国文学》2024年第1期,第104—106页。

^② 在非洲本土学界,关于姆本贝与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关联,参见 Charles Romain Mbele, *Panafricainisme ou Postcolonialisme? La Lutte en cours en Afrique*, Yaoundé: L'Harmattan Cameroun, 2015; Léon-Marie Nkolo Ndjodo, *La Théorie Postcoloniale. Culture, Capitalisme et Chaos*, Stuttgart: Ibidem Verlag, 2021; Benoît Elie Awazi Mbambi Kungua, *Emmanuel Macron, Achille Mbembe et la Françafrique: Une Déconstruction Théologico-politique*, Paris: Les Impliqués Editeurs, 2021。

“非洲世界主义”，但他对差异哲学和受害者意识的批判确实能为中国读者重新审视近一百五十年来的泛非主义、民族主义、非洲社会主义带来新的参照坐标。我们应了解看待政治发展的非洲本土视角，客观评价独立以来不同政治制度探索的得失利弊。而在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层面，姆本贝对构建非洲政治哲学的批判和建言本身已是我们一份珍贵的人门指南。我们不妨站在他的肩膀上，批判地梳理非洲当代政治哲学的筚路蓝缕，虚心地倾听喀麦隆、非洲的声音，并以非洲人听得懂的表达传递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哲学思考。